

左翼民粹主義： 理論與戰略的反思*

蕭育和**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

本文藉由對拉克勞與慕芙基進民主理論的探究，闡釋左翼民粹主義在其理論建構中，兩個特有的環節。一方面，作為政治本體論預設的對抗關係，無法轉化成任何具體的敵人形象，另一方面，在實體政治動態上的霸權形構，其效應是通過個殊元素對普遍性的佔位，而以競逐空位的方式來展現。這些理論構思同時也是對於當前自由民主現狀和左翼政治戰略的深刻反思，而分別在本體與實體層次上雙生的間隙，以及兩者之間立即的相互指涉，則讓左翼民粹主義有別於右翼民粹主義，這也回應了部分左翼民粹主義所引起的爭議。

關鍵字：左翼民粹主義、基進民主、對抗、霸權、間隙的立即相互指涉

* 感謝三位審查人之審查意見。本文大幅改寫自〈左翼民粹主義：左翼的救贖還是民粹的誘惑？〉，該文曾發表於中研院人社中心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博士後暨博士培育研究成果發表會（2019/7/26），感謝評論人朱元鴻的寶貴意見，以及陳宜中的評論，也感謝蔡明璋對論文初稿的評論。本文相關研究亦受中研院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補助，一併致謝，唯一文責由作者自負。

** E-mail: yuhehsiao@gmail.com

收稿日期：109年8月21日；接受刊登日期：110年7月26日

壹、裝睡的左派叫不醒？

在 Didier Eribon 的自傳式回憶錄《重回蘭斯》(Returning to Reims) 中，他談起了在成年 35 年後才重回家鄉蘭斯的緣由。Eribon 的政治意識來自於他藍領家庭堅定不移的政黨認同，在他的幼年記憶中，「一起去投票（給共產黨或社會黨）」是家族重要的神聖時刻。不過，隨著他的成長與踏入菁英知識圈，以及「發現」自己的同性戀身分，他與曾經是他政治意識啓蒙者的父親之間嫌隙日深，父親無法理解兒子書架上艱深的理論讀物，對「工人階級的解放」有什麼用，對於兒子帶回家來的那些高談策略與戰術、縱論文本與結構的運動夥伴，爸爸更是不以爲然；青年時期的 Eribon 對這個曾經啓蒙他政治意識的父親也越加不耐，理由很多：父權、粗俗無知、恐同厭女等等。

19 歲以後，Eribon 就在巴黎求學定居，35 年來再沒跟爸爸見過面，直到爸爸過世後他才回到家鄉。其實，工人階級的出身一直都是 Eribon 在巴黎過不去的一道坎，在需要揭露自己家庭出身的場合，每每讓他感到尷尬，工人階級的背景與菁英知識圈之間的衝突，讓他痛苦地意識到「必須扮演兩個越來越沒有連結、越來越無法共處的社會身分」(Eribon, 2013: 166-167)，其中的衝突張力幾乎讓他失去生命的平衡。回到家鄉參加喪禮的 Eribon，意外發現這個左派鐵票家庭已經默默改變投票傾向，這是他提筆寫下回憶錄的緣由之一，也是取名「重回蘭斯」的原因。媽媽現在是 Marine Le Pen 的支持者，雖然媽媽還是會強調第二輪投票不會投給民族陣線，而過去抱怨資本家剝削的氣力，現在全部轉移到抱怨公寓裡總是成群結隊、大聲嚷嚷的北非移民青少年。當 Eribon 嘗試跟媽媽「溝通」她的新政治認同時，媽媽的回答是「左還是右，沒有差別，反正，最後買單的都是同一群人」。雖然如此，Eribon 還是感受到一個最大的差別：像媽媽這種藍領階級出身的人，終於可以大方地踐踏與瞧不起其他族群了。最後，他對於這個家族的政治轉向有如此的結論：

我相信，投票支持民族陣線的原因肯定是因爲（至少部分是），
工人階級相信這是捍衛他們集體認同的最終手段，特別是他們的

尊嚴是被那些曾經聲稱做他們代表、聲稱捍衛他們尊嚴的人所踐踏。(Eribon, 2013: 132)

Eribon 家族故事的部分環節仍有待實證研究的支持。例如，歐洲工人階級是否大規模地改變投票意向？不過，這無損於一個同情左派的知識分子，對於傳統左派當前處境的焦慮，也就是戰後左派在政黨認同、治理論述乃至於政治策略上節節敗退的現象。這個現象至少可以回溯到 80 年代，時值戰後凱因斯主義作為政策指導的「黃金三十年」，左派（至少學院左派）的政治與智識議程，轉向了所謂的「身分政治」或「文化政治」，文本、論述、主體與結構等等這些在 Eribon 父親看來，不知道對工人階級的解放能有什麼助力的詞彙，取代了階級成為學院的新時髦。Richard Wolin 批評 80 年代的左派「過早地把公共場域禮讓給了左翼的傳統敵人，把自己小眾化、弱化且迷失了方向」，並嘲諷學院左派，在右派的共和黨人還牢牢掌握國家的 80 年代，他們卻忙著向「現代語言協會」的堡壘發動猛攻，用「文本的政治，取代現實實存的政治」；他嘲諷地說，如果要為 80 年代的左派寫部小說，它的標題最好應該是「裝睡的左派叫不醒」(while the left slept.....) (Wolin, 2006: 245, 243)。

在 Eribon 的家族故事中，左翼政黨與勞工階級的疏離其實存在其他不一而足的結構性因素，諸如先進民主國家中政黨認同普遍降低，以及傳媒環境的改變對代議選舉活動所造成的衝擊、建制政黨出於各種因素而越來越與他們曾經紮根的社群疏離等等。讓當代基進民主 (radical democracy) 的重要理論家拉克勞 (Ernesto Laclau) 與慕芙 (Chantal Mouffe) 更為憂心的是，左翼政黨在代議體制中失去接合社會不同領域、形構進步政治霸權 (hegemony) 的能力。拉克勞在 80 年代末就指出左翼政黨錯失了「壟斷性資本的擴張越來越與自由民主體制矛盾」的歷史契機，而這本應該是「對民主自由的捍衛與延伸，越來越與另一種社會主義論述密切相關」的歷史機運 (Laclau, 1987: 163)。錯失這個歷史契機，預示了三十年後右翼民粹主義的全面崛起，以及左翼政治今日更為險峻的處境。彼時讓拉克勞與慕芙聲譽鵲起的是《霸權與社會主義戰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一書，其副標題就是「邁向一種基進的民主政治」(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該作即指

出，重整「純粹政治」的本體論（ontology）邏輯，對挽救左翼政治無比重要，而挽救馬克思主義與挽救既有的自由民主體制，實質上是同一回事。

Richard Wolin 對於左派（特別是學院左派）的嘲諷固然尖銳，但他「迷途左派」（disoriented left）的批評確實指出當前左翼政治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也就是，從 70 年代開始興起的性別、族群、反戰等等新社會運動，「如何能與傳統左翼的方向及目標調和？左翼能完全進入這個深水區（uncharted waters）嗎？」在 Wolin 看來，拉克勞與慕芙對「基進民主」社會主義戰略的構思，即是左翼政治面對此一現實難題的重要理論成果；然而，在他看來，基進民主理論透過援用施密特作為對抗（antagonism）關係的政治性，來重整「純粹政治」的基本思路，卻相當可疑。他認為，以對抗作為政治性（the political）的界定，風險是「混淆了進步與反動政治之間的區隔」，將「對抗拉抬到一個無可質疑的優先地位」，風險恐怕是「道德與政治上的沒有下限」（a moral and political free fall）（Wolin, 2006: 244, 249）。

Wolin 對於基進民主理論的質疑，值得延伸並細細剖析，他懷疑左翼的戰略論述是否真的需要為了正視各種不同議題與訴求的新社會運動，而放棄傳統的階級立場，甚至引入一個可能沒有政治與道德下限的「政治性」敵我對抗。Wolin 自然對基進民主的戰略構思有所質疑，然而，即便是同情基進民主對階級「去本質化」構想的 Rodolphe Gasché 也質疑，如果在基進民主對進步政治議程的霸權形構中，不存在某種類似階級的核心要素，那麼，是否無法預先排除某些「非民主」的內容，成為建構左翼霸權的主要基底？（Gasché, 2004: 29-30）左翼的政治戰略固然需要正視現代社會中，各種非依階級形成的政治抗爭，並通過不同議題與議程的接合彼此加以串連，但 Wolin 與 Gasché 也都擔憂一個完全去本質化的政治戰略，是否因為強調對抗關係，無法在理論上預先排除非民主的內容，反而成為某種排除異己的反動戰略。而在慕芙提出以「左翼民粹」來抗衡當前在歐美國家盛行的右翼民粹浪潮時，Didier Fassin 也質疑所謂的「左翼」民粹，會不會只是用另一種實質性的共同體想像來抗衡右翼民粹浪潮，他認為，慕芙對於民粹浪潮的診斷固然頗有啟發，但在她的左翼民粹戰略中，「人民」看起來只是依據另一種政治議程，也就是反對新自由主義，而被動員起來，其中「沒有為參與式民主及人民說

話留下太多空間」，左翼民粹所想像的人民「似乎還是沒有聲音，還是透過領袖說話」（Fassin, 2019: 89）。Fassin 的質疑是，左翼的政治戰略是否需要爲了抗衡右翼民粹，而跟進使用「民粹」手段？Richard Wolin、Rodolphe Gasché 與 Didier Fassin 的關注方向固然不一，但實際上都直指在基進民主的戰略中，對抗關係的理論位置爲何？如何避免出於對對抗關係的著重，而導致政治互動規範的沒有下限？如何處理「非民主」的內容成爲進步政治議程的主導元素？甚至，如何說明左翼的民粹在什麼意義上絕對不同於右翼民粹？這些都關乎拉克勞與慕芙以基進民主論述爲基底所提出的「左翼民粹」（left populism）政治戰略的可行性。這幾個涉及左翼民粹戰略的核心論題，也分別對應本文對於左翼民粹戰略幾個重要理論環節的檢視。首先，作爲「政治性」的對抗關係在左翼民粹戰略中的核心地位，這個論題也涉及拉克勞與慕芙對於當前自由民主體制困境的診斷，以及其對於「民粹」概念的特殊用法，這是本文第二節與第三節的主題。第二，Wolin 認定本質上是納粹右翼的施密特式「政治」概念，與自認挽救左翼政治的基進民主論述，兩者之間必然水土不服，難以調和，那麼，左翼民粹的論述如何在承認對抗關係的前提下，同時兼顧傳統左翼的政治議程，並正視「新社會運動」對其所造成的衝擊？這個論題涉及拉克勞對於霸權形構的複雜論理，將是本文第四節的主題。最後，以基進民主論述爲基底的左翼民粹戰略，是透過什麼樣的理論環節，來確保其不會成爲拉克勞與慕芙所批判的「右翼民粹主義」？這個論題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其特別具有現實政治實踐意涵，也在於左翼民粹必須從理論層次上論證其與右翼民粹在「本質上」的差異，而不僅僅只是「不同的」民粹主義選項，這將是本文第五節的主題。

貳、民粹：無法消解的對抗

拉克勞與慕芙對於「民粹」一詞的使用，至少具有三個意涵：(1)作爲對某種對抗（antagonism）關係的類比，這樣的對抗關係，正如拉克勞與慕芙反覆強調，是政治生活中無可迴避也不可能消除，定義「政治性」（the political）的根本面向。(2)作爲某種無法爲既有自由民主體制所吸納，以「人民」爲名

的政治能量。如果自由民主體制的實踐能夠運行順暢，原則上不會存在對體制冷漠甚至於「反體制」的民粹能量。(3)特指某種版本的右翼民粹主義，其通過形構出某種僵固的政治一致性（族群、民族或宗教），將對抗關係實體化為「敵我」，對於拉克勞與慕芙來說，這樣的右翼民粹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反民主」的民粹主義。

在拉克勞與慕芙看來，民粹主義的潛流，是自由民主的實踐中，無法迴避的現實，民粹總是以某種對抗關係的樣態，而對政治的建制造成程度不一的衝擊。但是，基進民主乃至於左翼民粹戰略，並不是某種「規範性」的政治學說，並不是透過指出「政治性」作為對抗性關係的公理，再據以推導出相關的社會規範；相反，它是一種「戰略」，一種社會主義戰略，一種因應現實政治變局，面對民粹潛流的具體戰略。此一現實政治的變局，就《霸權與社會主義戰略》的成書脈絡來說，戰後「黃金三十年」以凱因斯主義為政策指導的福利國家實踐，儘管是社會民主理念的成就，但卻沒有完全消弭社會場域中的對抗，以性別、性取向、種族、族群等等「非階級主體訴求」的「新社會運動」所反映的是「壯大中產階級」的社會經濟治理手段，並無法消除社會場域中的認同鬥爭。也就是說，自由民主的體制中無論如何都會具有一個不可能為技術治理完全消弭的對抗關係，這樣的對抗關係在過去左右翼政黨，因為階級立場與社會經濟政綱而壁壘分明的自由民主競爭格局中可以得到相當程度的消解，如果沒有這樣的「爭勝性（agonist）政治格局」，那麼一個結果便是當前右翼民粹主義對政治能量的收割。對拉克勞與慕芙來說，左翼政治沒有其他餘裕空間，只有一個選項：必須構思出一種社會主義戰略，得以涵括種種非以階級立場為主要訴求的社會性要求，並通過一種以「爭勝」界定政治對手的「民粹論述」，吸納體制中的民粹能量。這既是社會主義唯一的「後馬克思主義」出路，同時，也是挽救自由民主體制空洞化危機的唯一解方。

易言之，基進民主的「基進」之處並不在於推翻以自由主義思想為基底、以代議政治為形式的自由民主機制，「解放的計畫不再能以國家的消滅來構思」（Mouffe, 2018: 3）。左翼的政治理念需要依附自由民主的建制而推進，自由民主的實踐最終只有在社會主義理念的引導下，透過社會各個場域的民

主化，才能深化並成就其理想，如拉克勞與慕芙所說，「左翼的任務從而不是放棄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而是在一個基進與多元民主的方向上，將之深化，將之擴大」（Laclau and Mouffe, 1985: 176），也就是說，自由民主體制遠遠不是左翼的負債，而是資產，或者，更中性地說，是一個必要的條件，它固然不是右派所設想的歷史終結，但同時也不能當作資產階級管理委員會的機制，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是「社會抵抗之基進化的可能性條件」（Smith, 1998: 6）。某種程度上，基進民主的「基進」之處在於它能為自由民主體制提供超克其內在困境，又保留其進步意涵的新方案。¹

戰後左翼需要做的，不是全面毀棄自由民主體制，而應是重拾自由民主體制本有的爭勝性，來重新賦予其活力。但晚近二十年的現實政治變局卻是左翼政黨向「中間路線」靠攏。新自由主義的治理的霸權地位，反映在傳統左右政治光譜的消失，歐洲主流的左翼政黨即使在重新執政後，不只無能扭轉這個新自由主義化的趨勢，在慕芙看來，更糟糕的是，主流左翼政黨還極力向中間路線靠攏，例如 90 年代由英國工黨首相布萊爾及其策師紀登斯所力推、超越左與右的「第三條路」，左翼與右翼政黨都「向中靠攏」，越來越相像的結果是不再能區分左翼與右翼。早在「第三條路」論述風行的 2000 年前後，慕芙就已經警告了民粹主義的席捲，預言了 Eribon 的家族歷史：

右翼民粹政黨能在許多國家長驅直入也就不足為奇。在許多個案中，他們是唯一譴責中間共識的人，他們想方設法佔領左派所棄守的競爭性地帶（*contestation terrain*）。特別值得憂慮的是，勞動階級中許多人感覺，比起社會民主政黨，右翼民粹政黨更能捍衛他們的利益。一旦對傳統的民主過程失去信心，這些人就成為右翼民粹領袖的囊中物了。（Mouffe, 2000: 7）

1 就這點來說，作為所謂「後馬克思主義」的標竿人物，拉克勞與慕芙相當程度上填補了歐洲「新馬克思主義」的白卷，誠如 Perry Anderson 所指出，在發展出一種「足以理解並分析作為布爾喬亞權力成熟形式的代議民主，其本質與機制所包含的各種問題的政治理論」這件事情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流著作是完全缺席的，儘管這些問題「完全沒少於資本主義經濟」（Anderson, 1976: 47-48）。

對慕芙來說，左翼政黨的向中靠攏並不是一個偶然現象，某種程度上，這個現象是自由民主體制主流論述的對應後果。在她看來，主流的自由民主論述，意圖通過程序或者理性，來消解對抗並達致共識，而這正也是讓自由民主體制陷入危機的主因。慕芙接受施密特對政治作為「敵我之別」的獨到立場，強調政治生活中的對抗性面向，是不可能也無法完全消解的。在慕芙看來，施密特的洞見在於他對於政治一致性（identity）的命題：² 政治的一致

2 要注意的是，慕芙對於施密特的思想是一種高度的「化用」。施密特當然如慕芙所說關注自由民主實踐過程中的空洞化問題，然而，施密特所欲辨明的是由自由主義理念所推導的議會實踐，其本身並不是「民主」作為政治一致性的政治建制。慕芙確實正確地指出施密特所說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之間對於平等理念本質上衝突的構思，然而，慕芙是將此一衝突轉化成自由民主體制中合理多元主義所表現的差異邏輯，以及接合種種差異以形成一致的民粹性邏輯，兩者之間的衝突，慕芙認定這是自由民主體制所應該需要復興的張力。然而，對施密特來說，「民主」的建制所表述的始終是一個具體的實質一致，而不是任何霸權接合的暫定成果，甚至也不是左翼民粹論述中對對抗關係的本體預設。對施密特來說，政治只說明「一致性的強度」，政治一致性可以包含不同的內容，但它「始終說明一個一致體的最高強度」，由此而來即是一種強度最大的區分：敵友之分（Schmitt, 1999: 203）。在施密特看來，民主正是這樣一種預設敵友的建制，從未存在過一個「不承認『外國人』，能夠真正落實人人平等的民主國家」。在施密特看來，一個特定領域的平等，其價值與實質來自於特定領域對平等與不平等的劃分，無論這些不平等有多麼嚴重與不公，都與自由主義式「人的價值」無關，政治作為一種特定領域，不能掏空它的政治因素，只留下「人人平等」的普遍論述（Schmitt, 1985: 11）。慕芙對施密特的「化用」反映了兩人對於自由民主體制的不同立場，施密特擔憂自由民主體制會因為自由主義與民主的衝突而從內瓦解，而對慕芙的左翼民粹論述來說，她相信：(1)必須承認現行的自由民主體制是普遍平等的自由主義理念與區分我群和他群的民主理念，兩者之間具有張力的結合，兩者皆無法割捨；(2)既有自由民主體制因為普遍平等的自由主義理念，而在社會各個領域中激發出對於「新權利」的需求，無疑是需要保留的部分，同時它們也是霸權動態形構的機緣；(3)任何嘗試消除「對手」的民主理念，例如以利益競爭者來構思民主競爭的熊彼得式民主理念，以及著重理性共識的審議或對話式民主理念，都是需要斷然捨棄的民主理念。左翼民粹論述通過施密特的化用，對於自由民主體制的角色，也產生了兩個或有必要省思的後果：第一，相較於 Ranciere 或者 Negri 等等因為嘗試構思「超克自由民主體制」，而同樣被歸為基進民主陣營的理論家來說，基進民主的左翼戰略事實上「保守」許多；第二，在他們看來，就其作為政治場域的互動規範來說，自由民主體制僅僅只是一個與現代社會合理多元主義相容的政治建制，而這個建制所產生的結果，就其本身並沒有任何規範上的優越地位，無論這是政治利益的調和，還是正當程序的結果，更遑論作為「更理性」的共識。某種意義上，自由民主體制僅僅只是適切於霸權佔位政治實踐的制度性場域。這樣的理解，意味著在左翼民粹戰略思維中，自由民主體制中更為重要的要素，實際上是有能力在自由民主體制中進行霸權性操作的建制左翼政黨，而非自由民主體制「本身」。此一就左翼民粹戰略中對自由民主的論述，所可能造成的新問題，筆者感謝審查人的提醒。

性在於「一種能從社會關係的多樣化形式中，所出現的他我關係、敵我關係的樣態」(Mouffe, 2005: 14)，這也是慕芙為什麼要反覆強調，政治「無法侷限在某種形式的制度，或者設想成社會的一個特定場域或者層次」，而必須作為「一個內在於所有人類社會，並決定我們根本的本體境況的面向」來構思(Mouffe, 1993: 3)。

然而，主流的自由民主論述卻將政治設想成一個中立的地帶而將之「去政治化」，不同的行動者單純只是在其中彼此競爭，無視於不管是通過理性或者程序，政治性的對抗都無法完全被消滅。不願正視此一現實的主流自由民主論述，自然無法「在多元的民主體系中給予它們政治上的出口」，慕芙強調，如果要說當前的自由民主體制能有什麼巨大的力量，應該在於它能正視對抗無可消解這個前提，並「以一種緩和敵對 (hostility) 潛能的方式，來形構敵對的要素」(ibid.: 5)。而這也涉及她對施密特重要的理論性修正。在慕芙看來，施密特式的「敵友」只是對抗關係的一種極端樣態，慕芙對施密特的創造性詮釋是保留這個作為「政治」的對抗性面相，而將「敵人」(enemy) 轉化為「對手」(adversary)，並將難免訴諸生死的對抗，化為承認對手的爭勝 (agonism)：

一旦我們承認政治是必要的，並且不可能存在一個沒有對抗的世界，那麼需要正視的就是在這些條件下，創造或維持一種多元的民主秩序如何可能。這種秩序基於敵人與對手的區分，而在政治共同體的脈絡下，它要求不能把反對者視為有待消滅的敵人，而應該作為一個其存在不僅是正當，而且要被容忍的對手。(ibid.: 4)

對抗是一種雙方為敵，並不共享共同基礎的我他關係，爭勝則是衝突的雙方，雖然認識到衝突沒有理性解決的方法，但卻願意承認對方的正當性，他們是對手，而非敵人……屬於同一個政治結社，共居於一個抗衡發生的符號空間……民主的任務就在於將對抗轉化為爭勝。(Mouffe, 2005: 20)

慕芙認為，只有透過將作為「人類社會與共同體中一個無法消解與泯除的對抗面向」的「政治性」(ibid.: 9)，重新帶回自由民主體制，才能挽救其危機。而以自由主義思想為基底的現代自由民主體制，由於其個人主義的預設，導致了對政治性的盲目，這讓它「無從理解集體一致性的形構」；相對之下，由「政治」預設，無從消解的對抗性面向，所關注的則一直都是「對立『他們』的『我們』形構」。既然對抗關係始終存在於政治生活之中，民主政治的真正挑戰就不在於訴求完全消除異議與對抗的共識，而是對「建構不同我他關係」的想像，藉由「以不同的方式所建立的我他關係，試著保持對抗出現的平衡」(Mouffe, 2013: 4; 2005: 16)。在慕芙看來，所謂的「第三條路」是「沒有對手的政治」(Mouffe, 2000: 108)，沒有對手一方面意味著「沒有真正選擇的空間」，沒有「黨派的對立」，政治就只剩下「中立地經營管理政治事務」，「政治問題也被化約成專家處理的單純技術論題」，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公民所要扮演的角色就只剩下「贊同那些專家精心擊劃的理性政治」(Mouffe, 2018: 4)，用慕芙自己的比喻來說，只剩下喝可口可樂還是百事可樂的「選擇」。但另一方面，「沒有對手」肯定並非意味著對抗性面向的消失，無從在自由民主體制中消解的對抗性能量，終究會找到自己的出路，此即慕芙對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的診斷：右翼的民粹政黨壟斷了自由民主體制中對對抗性面向的詮釋：

政治界線的消失遠遠不是什麼政治成熟的象徵，而是一種空洞(void)的病徵，它危及了民主。這個空洞給極端右翼一個可以佔領、去接合(articulate)新的、反民主之政治一致性的地帶。一旦少了民主的政治性鬥爭所識別的東西，其空間就會被其他的一致化形式所接手，族群、民族或者宗教本質，以及用這些詞彙所界定的反對者。在這樣的狀況下，它就不會被當成競爭的對手，而只能是需要消滅的敵人。(Mouffe, 1993: 6)

慕芙將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歸因於自由民主代議體制因為左右翼壁壘消失，使得人民失去「真正的」政治選項，對代議體制疏離的同時，此一無

從在體制消解的民粹能量就以反動的形式而向自由民主體制反撲。而在這段話中，她表明，右翼民粹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接合」社會要求的特殊形式，對於基進民主的戰略構思來說，如何建構出另一種「左翼民粹」的接合形式？這個部分將特別涉及拉克勞對於民粹概念的特殊用法，也是下一節所要討論的重要理論問題。

參、一種「好的」接合邏輯

在慕芙看來，右翼民粹政黨的崛起是對「中間共識（consensus at the centre）政治形式」的反動，他們成為「唯一代表人民意志的反建制力量」（Mouffe, 2000: 116）。右翼民粹主義為當前「沒有真正選擇」的自由民主體制，提供了一個「政治性」的選項，右翼民粹政黨的崛起，正是當前普遍流行，「政治的終結」時代精神的結果（Mouffe, 2005: 51）。因此，極端右翼的茁壯，「只能從自由民主所面對，伴隨政治傳統標記的消失，政治一致性的深刻危機這個脈絡下來理解」，而其對抗性界線劃出一個具體且無法妥協的「對手」，無論是移民或者歐體官僚，與其說是對手，更妥切的說法或許是他們成了必須消滅的敵人，在慕芙看來，要對抗右翼民粹主義，一個重要的線索是「重劃敵友政治界線」（Mouffe, 1993: 4）。

僅就表面上的形式來說，民粹主義是「一種在人民與寡頭（oligarchy）之間構建出政治界線的論述性策略」（Mouffe, 2018: 5）。從慕芙對民粹主義的形式界定上來說，它僅僅只涉及劃出人民與人民敵人之別的政治界線，但界線如何劃分，以及界線兩邊的具體內涵，都不存在具體的指涉，這是「民粹主義」這個政治詞彙的特殊性質，它本身在概念內涵上極為模糊，不同於其他的「主義」，民粹主義的具體內涵可以說相當彈性，或許唯一可以識別的特徵就只有政治界線的劃分與對抗關係的指認。同時，民粹主義就其本身來說也缺乏規範性論證，換言之，民粹主義無法以其內涵，只能由其「形式」來加以界定，其政治主張相當程度上無關乎規範性訴求，甚至無從以具體制度加以安排。對此，Mudde 與 Kaltwasser 對民粹主義的「概念性」（ideational）定義，可以說相當貼切：

一種核心內涵稀薄 (thin-centered) 的意識形態，視社會可以根本上區分為兩個同質化並互為對抗的陣營，純粹的人民對腐化的菁英，並論定政治應該要是人民總意志的一種表述。(Mudde and Kaltwasser, 2017: 6)

這個在形式上對民粹主義所做的概念性界定，與慕芙對民粹的形式界定頗有互通。這裡涉及了左翼民粹戰略一個關鍵的主張：右翼民粹主義固然是需要批判的現象，然而，「民粹」這個概念卻因為隱含了某種作為對抗關係的政治邏輯，而足以挽救「沒有對手」的自由民主體制。不同民粹主義形式的關鍵差別，如慕芙對於左翼與右翼民粹主義之別的闡述：

即便以權力回歸人民之名拒斥既有的體系，卻不是所有對政治邊界 (frontier) 的民粹性建構，都以平等主張為目標。兩種民粹主義的型態都致力結盟未被滿足的要求，但卻是以不同的方式。差別在於「我們」的組成，以及對手「他們」如何界定。(Mouffe, 2018: 23)

這段話精要提示了左翼民粹異於右翼之處，主要有二。一方面在於「我們的組成」，這也呼應了拉克勞所強調，在重新構思取代階級的集體政治主體概念時，其中的連結 (links) 具有本體論上的優先 (Laclau, 2014: 7)；另一方面則在於「(對手) 他們如何界定」。下面就藉由**形成社會一致性的政治動態**，以及**對抗關係的本體地位**這兩個線索，來繼續深入探討拉克勞與慕芙對於「民粹」的特殊用法。首先，對拉克勞來說，民粹主義不能被視為「潔癖政治世界」(ascetic political universe) 中需要排除的危險因子 (Laclau, 2005a: 19)，民粹主義「核心內涵的稀薄」所指涉的是具體內涵上的模糊。不過，這個看似「概念上」的疏漏，卻正好是政治世界的常態，拉克勞反問：「難道民粹論述的模糊性 (vagueness) 不就是社會現實自身在某些情況下，模糊與不確定的後果？」對拉克勞來說，相比於其他可以在概念上圓融的意識形態或主義，民粹 (主義) 在概念內涵上的模糊，其實正好表述了在對抗關係中，「我們」

之何以形構的內在偶然，以及對於對手「他們」的模糊指認，所以，民粹反倒是表述了「政治行動所恆常具有的面向」（*ibid.*: 18），如拉克勞所言：

民粹的要素並不在於運動本身，也不在於其典型的意識形態論述，這些一直以來都有其階級歸屬；民粹的要素在於，**特定的非階級性矛盾，被接合到（民粹）論述中。**（Laclau, 1987: 164）

對拉克勞來說，民粹並不是指一種特定類型的運動或特定的意識形態等等可以由具體的訴求與內涵確定的政治活動，而是指將原先彼此不同的異質元素接合的關係連結，具體的政治能動者、社會基礎、意識形態、訴求主張乃至於運動形式等等，**民粹的形式界定是「接合這些內涵的特定邏輯」**（Laclau, 2005b: 33），這也是為什麼拉克勞會認為，模糊與不確定並不是民粹主義這個概念的疏漏，因為這正是「政治的邏輯」的根本特徵：

社會的邏輯在於法則的遵守，而政治的邏輯則關乎此一動態社會（the social）的建立，這樣的建立……並不是一個武斷的法令，而是自社會要求（social demands）而出，並在這個意義上，內生於社會變動的一切過程。這個變動……通過等同（equivalence）與差異的多樣接合而發生，而其等同環節預設了一個全面性政治主體的建構，能將多樣的社會要求聚合起來。（Laclau, 2005a: 117）

在拉克勞看來，民粹論述的模糊與不確定，所反映的是某些社會要求，經過種種不同社會力量的中介，而與其他社會要求，或切斷捨棄或接合，形成某種模糊的對抗立場或陣營的過程，這意味著，其內部不同元素之間的接合，基本上是偶然而非必然的關係，其間所呈現的即是無法化約成任何既有社會分歧衝突的「政治」邏輯。就此一實體（ontic）政治層次上的動態來說，民粹「主義」在概念內涵的不確定性，以及其在現實脈絡中對不同異質要素的偶然充填，所表述的是其作為政治與意識形態鬥爭所必要爭奪的戰場，也就是「主導性矛盾」的鬥爭戰場，「在一個具體社會形構層次的主導性矛盾

就構成了民粹／民主鬥爭的特殊場域」，在拉克勞看來，這個「戰場」有其自身的政治邏輯，無法由特定社會形構中既有的衝突關係直接推導（例如生產關係）；另一方面，民粹論述所表述的這個模糊對抗關係，「人民／權力集團（power bloc）的矛盾是一種對抗」，同樣也無法透過既有的社會關係來理解，³ 拉克勞強調，「要理解此一對抗並不在於生產關係，而在於構成一個特定社會形構，政治與意識形態支配的複合叢聚（complex）」（Laclau, 1987: 166）。此一以「民粹」模糊命名的對抗關係，就其作為**政治的本體論預設**來說，對於左翼民粹主義的理論探究至關重要。以下進一步要繼續討論的，即是對抗作為政治的本體論預設，以及在這個本體論框架下，政治在實體層次上的動態，這兩個關於民粹作為一種政治性接合邏輯的論題。

就民粹作為對抗關係而為政治本體論預設這點來說，此前曾經指出，拉克勞與慕芙都強調民粹作為一種政治論述，其對於政治界線兩邊的表述都是「模糊」，但不僅僅只是直觀上的「模糊」，在拉克勞對民粹的闡述中，界線兩邊的模糊，分別是對某種不定（indefinite）對抗關係的指認，而「我們人民」之內在構成的偶然性，拉克勞認定，這兩者是一體兩面，因為只有對抗關係是不定的，與之相對應的「我們人民」內部，才存在不同接合形式的可能。拉克勞強調，不定的對抗關係，就其概念上的「純粹」對抗，是位於表意符號體系之外的，它是無法被表述、沒有任何客觀的意義，也無從對之具體定名的「東西」（the Thing）。但拉克勞亦指出，正是這個無以名狀的存有，揭露了所有表意符號體系本身的偶然性建構，其中沒有任何「就其本質來說是如此」的東西。在這個本體論意義上，對抗是「建構性的外」（constitutive outside）（Laclau, 1990: 17-18），後來，拉克勞將之稱為「空意符」（empty signifier）：

3 拉克勞認定，在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中，「對抗關係」並沒有專屬的理論地位，也沒有邏輯上的獨立地位，對抗關係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必然衍生。可是，正如拉克勞所強調，從屬（subordination）與壓迫（oppression）是不同的概念，從屬關係並無法就其本身成為對抗關係，它不過客觀表述了不同社會能動者的差異位置，「反抗從屬的抗爭」並不是從屬本身情況的後果（Laclau and Mouffe, 1985: 154, 152）。也就是說，壓迫關係的生成其實是一個霸權動態形構的結果，它本身是無法為「客觀上」的經濟不平等關係所自然推導的。筆者感謝審查人的指正。

一個空意符不單只是沒有意指的意符……空意符爲了維持其指意（signification）的作用，必然意味著某個東西：此即一個在指意過程中浮現的間隙（gap），這個間隙並沒有自身的指意作用，但仍然要被命名，因爲它是所有指意過程的條件……而只有整個意符與意指關係被顛覆時，它才現身。（Laclau, 2014: 119）

空意符沒有具體的意指，它是對間隙的指認，拉克勞以此來表述社會要求與其對應社會體制之間的落差。舉個例子來說，當我們意識到某件事情不公不義時，這樣一個「正義」或「公道」的模糊想法，挑戰我們對既有體制的信任，它以「空意符」的樣子，意指了某個東西，例如，模糊的正義觀念，而表述了我們既有體制的不義，兩者之間存在著「間隙」與落差。而且，模糊的正義理念，因爲無法在既有體制中找到位置，所以挑戰了體制，也就讓我們意識到既有的體制可能是有所不足的。再借用拉克勞對於葛蘭西「義大利民族統一」這個主題的討論來說，義大利的統一有具體的政治綱領，但是，這個綱領是爲了一個超越其存在使命的歷史性工具，綱領與使命本身，就像特定的訴求與模糊的正義觀念一樣，與其現實建構之間，仍存在著許多有待接合的元素，在這個意義上，「義大利的統一」是一種建構性的外，它「沒有任何先在、注定要填補它的東西，從而向大部分紛雜的接合開放」。對拉克勞而言，這是一種「好的」接合，他繼續說：

在（這樣一種好的接合）其中，將不會有普遍性使命與具體歷史力量之間最終的縫合，所有局部性的勝利都會在一個終極與無法跨越的不可能性這個背景下發生。（Laclau, 1996: 63）

在民粹對於「我們人民」的建構中，「人民」同樣也是一個空意符，「人民的建構將是賦予此一或缺的整全（absent fullness）命名的嘗試」（Laclau, 2005a: 85）。民粹之所以可以是「好的接合邏輯」，是因爲它在透過模糊指認「人民對手」，也就是承認政治性的對抗性面向的前提下，在形式上確保了「人民」的建構，將因爲不定的對抗關係，而具有不同的內在連結關係。易言之，

對拉克勞來說，「民粹」所指涉的並不是能以特定訴求或意識形態所確定的政治活動，而是一種預設對抗關係、形式的政治邏輯，如 Marchart 所強調，民粹是「對抗邏輯最清楚的表述」，而這正是「界定政治性的特徵」（Marchart, 2018: 23）。在此，可以先行得出一個往後繼續檢視「左翼民粹主義」時相當重要的理論前提：**在拉克勞與慕芙的民粹論述中，這個作為對抗性面向的空意符，無論如何都無法具體化一種特定的對抗關係**，這是與認定一個具體「敵人」的右翼民粹，重大的差異之處。此一理論前提的現實意涵，在闡述政治的實體動態後，才能更深入探究，因此，往下要繼續的是在對抗關係的本體預設下，政治在實體層次的動態這個主題，這個主題也關乎 Wolin 對基進民主論述的質疑：左翼民粹的論述如何在承認對抗關係的前提下，同時兼顧傳統左翼的政治議程，並正視「新社會運動」對其所造成的衝擊？

肆、霸權作為一種佔位的動態

當拉克勞以「空意符」來指稱對抗關係時，他所強調的是此一對抗關係的「無以名狀」，畢竟，如果它可以在一個意義體系當中得到命名，它就不會是「純粹」的對抗。對他來說，對抗性關係並不會「客觀地存在」，而是客觀性界限（limit）之所在，對抗關係之所以會是「純粹」的，是因為它的存在會顛覆整個意義體系，這是一個「讓我不再是我」的「他」（Other），「這個關係並不是來自任何自體圓滿的整體性（full totalities），而是來自於建構這類整體的不可能性」（Laclau and Mouffe, 1985: 124-125）。但同時，這個純粹的對抗性要素對於意義體系的存在，又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因為對抗性關係根本上的顛覆效應，所以，在將之「排除」的狀況下，意義體系中的個別要素彼此之間，就有了連貫的可能，易言之，其作為表意系統的整體性才能不被顛覆，而又因為這樣的整體性是透過排除而生成，故這樣的整體性也就必然會是失敗的（failed）整體性。正因為有純粹的對抗性關係，所以不可能會有純粹的整體性，對抗性的要素於是就具有兩種重要，但在作用上彼此對立的角色：

一方面，它「阻卻」(block)了它所對抗的一致性與完全的建構，從而揭示了其偶然；另一方面，既然這個一致性只是關係性的，就不會是外於與之對抗力量的關係的東西……既阻卻一致性又同時肯定一致性之間的連結 (links)，我們就稱之為偶然性 (contingency)，它在客觀性的結構中引入了一個全然無以決斷的要素。(Laclau, 1990: 21)

拉克勞據此論稱，作為一切關係整體的社會 (society)，也就是一切人類生活的日常，都有這樣一個純粹對抗性關係的否定性 (negative) 基礎。於是，一種完全自體圓滿，可以用一個特定的表意邏輯所表述的「社會」本身是不可能的 (the impossibility of society) (ibid.: 90)。不存在諸如完全用生產關係這個客觀邏輯來表述的社會 (society)，只存在「動態的社會」(the social)。前者指的是一種「圍繞在一個能解釋社會方方面面過程的意義性閉合 (closure)」；而「動態的社會」所指涉的是「對意義的創造但又同時使得閉合不可能」(Worsham and Olson, 1999: 146) 的過程，「社會的動態只存在於對構建社會這個不可能的對象，徒勞的努力」(Laclau, 1990: 92)。

一個意義完全閉合，沒有任何排除的社會是不可能的，然而「動態的社會」也無法以完全變動的樣態存在。在拉克勞看來，純粹對抗關係作為建構性的外，既否定了表意體系的完全閉合，也肯定了表意體系的內在穩定，社會的整全 (fullness) 即便是「幻象」(例如「義大利民族統一」或者模糊的「良序社會」想像)，也是表意體系與社會能夠穩定運作的必要環節。然而，在純粹對抗的本體預設下，一個既作為幻象般整全又作為表意上無法切近的純粹否定與對抗，是如何出現的？誠如上述，在拉克勞對於民粹概念的闡述中，民粹同時表述了對對抗關係的指認，以及「我們人民」的建構，如 Marchart 所說，民粹主義一方面「社會空間圍繞著『人民』之名而二分」，另一方面「也將異質化的要求建構進一個相對於否定性之外的等同之鏈 (equivalential chain)」(Marchart, 2016: 320)，民粹性的「我們人民」，此一各種異質性元素之間等同鏈的建構，涉及了政治在實體層次的動態，拉克勞稱之為霸權 (對社會) 的形構，或者說普遍性的霸權性形構 (hegemonic formation)。在拉克

勞看來，對抗性關係作為否定性基礎，不僅意味著讓一個意義體系得到穩定的可能，同時也讓社會能以某種社會動態的方式延續下去。意義體系的存續以及社會的延續是一體兩面。普遍性所指的是體系內部的各個元素之間，一個相對穩定的共量性關係網絡，這個網絡主要是由等同（equivalence）以及差異（difference）所構成。對拉克勞而言，如果不存在這個能把個別元素的意義固著（fixed），以表述體系中元素之間的等同與差異關係，來建構意義體系的過程，就不會存在嚴格意義上的「政治」互動的可能。

普遍性的等同與差異關係網絡，並不是僵固不動的，作為一種意義體系，其狀態是在完全被對抗性要素所顛覆，以及一個全然固著不動的超穩定狀態之間擺盪。而在這個擺盪的過程中，霸權的形構暫時地將之穩定下來，此一霸權的運作，其作用首先是在體系的不同元素之間，創造出不均等（uneven）效應（Laclau, 2001: 7）。體系中會有某些特定、本身是個殊的元素，它承擔了建構普遍性的角色。而這個過程，拉克勞就稱之為「霸權」的運作：

有一種差異承擔了對一個與其無法共量之整體的表徵，而它並沒有因此不再是個別特殊的差異。如此，這個差異體就在其仍然是個殊性（particular），與其作為更為普遍的表意載體之間分裂了。此一藉由某個個殊性，對不共量普遍性表意的佔位（taking up）運作，即是霸權。（Laclau, 2005a: 70）

霸權是拉克勞從葛蘭西身上借來的理論詞彙，但在拉克勞手上，它有了新的意思，它不再（只）指涉某個特定階級聯盟的自我組織，而是指普遍與個殊元素之間成功的接合（Laclau, 2000a: 50）。霸權的運作，成功將某個特定的個殊元素建構成普遍性，並據此界定了體系中的等同與差異關係，也就是說，讓整個體系能夠運作。普遍性所指的並不是任何規範性乃至於實定性法則，其實它就是此一意義體系的關係網絡本身，以及網絡中各個元素各自的意義和關係，普遍性是「一套相應於個殊物之間，永遠都是有限且可逆的（reversible）關係的命名」。由於普遍性此一關係網絡是通過霸權中介所偶然建構出來的，是故其中的關係，始終存在透過不同的霸權形構，而生成不同

意義網絡的可能 (Laclau, 2000b: 194)。

那麼，什麼樣的個殊性能夠承擔普遍性表意的佔位呢？在拉克勞看來，**沒有任何的因果與必然關係可以確保某個個殊性元素，能夠佔據表徵普遍性的空位**，他認為，現實政治慣用的所有詞彙諸如「正義」或「革命」等等，都是「沒有必然相應的內容」，並不是說這些規範性概念本質上皆為虛無，而是其具體內容必須首先透過某個個殊性元素「機緣偶然性地把空的普遍性，具體體現出來」，這個「霸權性運作」才能確定 (Laclau, 2001: 9)，可以說，在任何特定的在地脈絡下，這個「佔位」都是各種因素所「多重決定」(over-determinate) 的結果。某個被偶然附著的元素，通過多重決定的機制，賦予特定個殊元素構造整個意義體系的核心地位，以及形構社會動態的重要角色。

因此，除了賦予普遍性某種相對穩定意義體系的角色之外，霸權性形構的另一個意涵，所指的就是個殊與普遍之間，通過佔位所衍生的動態關係。如拉克勞所說，「只有在個殊與普遍的二分被取代時」，霸權才會存在，在這個霸權的形構中，普遍「只會具現 (incarnate) 在某個個殊之中」，沒有個殊對普遍的佔位，個殊如果「沒有成為普遍化效應之所在」的話，它就不會是「政治的」(Laclau, 2000a: 56)。而霸權所形構的主宰關係，以及透過這個主宰關係創造出來的等同與差異關係，這些彼此被接合起來的關係所形構的網絡，也是偶然可變動的，總是存在反覆不斷「換位」(dislocation) 又重新接合的可能。對拉克勞來說，這正是「政治」的實體動態所在，它與「社會的不可能性」此一本體論預設，同樣一體兩面。在霸權形構的鬥爭中，所涉及的就是不同的特定個殊性元素，對於普遍性空位的爭奪。

需要注意的是，個殊元素對普遍性的「佔位」，僅僅只是「佔位」而已，並不是此一個殊元素，就轉化成了普遍的元素，兩者之間的連結，同樣也是偶然武斷的，無法由任何法則或規範保證。「普遍不過就是在某些時候成了主宰的個殊性」，如拉克勞強調，「所有個殊性中浮現的普遍性」，並不是「作為個殊性的基底原則」或者「解釋個殊性的原則」，若然如此，則兩者之間就會具有某種本質性關係。然而，霸權運作所接合出來的普遍性，所指的不過是一種暫時性的意義網絡，是霸權介入、對既有元素的換位後，所形成的一種「被換位的個殊性一致」(dislocated particular identity) (Laclau, 1996: 28,

26)。拉克勞曾經相當精要地總結了以霸權的形構，來說明政治在實體層次上動態的四個主張：

我的霸權理論宣稱：第一，在任何使得符號性一致化不可能的結構性安排中，都有建構性的換位；第二，既是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得以填補結構性缺失的對象物，都只能是一種個殊具體的對象物，它承擔了促成一種與自身不相容之整全的角色；第三，這個連結本質上是偶然性的，表徵關係並非邏輯性……第四，……整全性意符與各種具現整全性的對象物的附著（attachment）並非永久的。（Laclau, 2004: 299-300）

在這個個殊性元素「化身」普遍性的過程中，可以看到「空意符」在喻意無以名狀的對抗關係此一本體性範疇之外，作為霸權形構實體動態的另一個意涵。雖然有時候拉克勞並不特別區分兩者，⁴但兩者在概念上是可以區別出來的。就前者來說，「空」所指涉的是在本體論層次上，對於「無以名狀」或「無以命名」的表述；就後者來說，「空」所指涉的是「有待充填」或「有待佔位」，在實體論層次上，一個意符在不同脈絡下可以被填充不同的內容，就此而言，意符本身是「模糊歧義的」（equivocal），而非全然空無（Laclau, 1996: 36）。也就是說，在拉克勞的理論中，存在某種雙生的間隙（gap），一方面是在實體的政治動態上，在個殊對普遍佔位的過程中，個殊與普遍之間的間隙；另一方面，霸權的普遍化效應所對應出的任何對抗關係，與純粹的對抗關係之間，也同時存在著間隙。繼續要就空意符的此一雙重意義，也就是雙生的間隙，來檢視左翼民粹之何以不會成為右翼民粹主義。

4 例如拉克勞這段話，「在一種全然無序的狀況下，『秩序』是以缺席的姿態出現的，它成為一個空意符，一個表意缺席的意符。在這個意義上，各種政治力量得以盡其所能競逐，將他們特定的目標當作完成對這個缺失的填補，將某個東西霸權化，確切來說就是完成這個填補功能」（Laclau, 1996: 44），其中，「在這個意義上」前後所指的分別是空意符在本體論層次與實體論層次的不同意涵；而在他對於民粹的討論中，本體層次上「在動態的社會（the social）中建構對抗性邊界」與實體層次上「將異質的多樣需求在等同之鏈中一致化」，都是「空意符的生產」的一體兩面（Laclau, 2005a: 154）。

伍、雙生間隙之間的相互指涉

此前曾經提及，在拉克勞與慕芙對於民粹的論述中，與右翼民粹主義有一個根本的差異，即是其論述自始就阻卻了對抗關係以任何具體的「敵人」形象出現。現在可以再進一步深化這個論題：**作為政治本體論預設的對抗關係，無法轉化成任何具體的敵人形象；而在實體的政治動態中，對抗關係的預設會以霸權形構的效應，通過個殊元素對普遍性的佔位，在體系內部以競逐空位的方式顯現出來。**在這樣的佔位中，個殊性元素通過佔位所產生的普遍化效應，在這個不同勢力彼此爭鬥的戰場中，都無法永久續存，始終存在著反覆變動的機緣。對拉克勞來說，個殊與普遍之間存在著無法橋接的距離。同時，民主與民粹之間的連結也在這個過程中浮現，在拉克勞看來，民粹是社會中各個孤立的民主性社會要求無法得到滿足而彼此接合的結果，它既界定出模糊的「人民」一致性，同時也識別出「人民敵人」。而從孤立民主要求到等同性民粹要求的運作，會讓既存的差異性系統崩潰與重構，「結果是介入這個確定中的等同性，會沿著許多不同的方向運作，原先的內在政治邊界，也就變得越來越無法確定」（Laclau, 2005a: 84-85, 86）。這就是各種「新社會運動」透過訴求新權利，對既有權利體系造成衝擊的狀況。換言之，如果個別孤立的民主性要求可以為體制所回應並得到滿足，就不會有民粹性串連的可能，而民粹性串連所造成的效應，即是重構整個既有意義體系，重新形構霸權的可能，其中的運作機制，是一種民主要求不再孤立，而彼此形成連結，形構出民粹性要求的過程。民粹的運作機制，也就是霸權形構中「普遍與個殊之間建構性的不對稱」（Laclau, 2001: 7），此即民主的「基進」意涵，如拉克勞所說：

假如民主要得為可能，則**普遍性就不能有必然的化身與內容**，不同的群體彼此之間相互競爭，以求用自身的個殊，暫時地賦予表徵普遍性的作用。社會會產生一整套空意符的詞彙，其暫時性的表意是政治競爭的後果，正是這個社會將自身構建為社會這個終

極的挫敗……創造了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無法橋接的距離。
(Laclau, 1996: 35)

讓基進民主的民粹論述之有別右翼民粹主義的理論環節，在於其論述中的「雙生間隙」(double gap)，一方面是在本體論層次上具體對抗與純粹對抗之間間隙，另一方面是在實體論層次上，在霸權形構過程中，個殊元素與普遍之間間隙。就此來看，對拉克勞與慕芙而言，右翼民粹主義與當前的自由民主體制，其實是以不同的方式，取消了雙生的間隙。就前者來說，一個具體的敵人形象（移民、歐體官員、對歐洲文化的威脅），同時消解了對抗關係的不可能以及普遍性霸權動態中元素換位的可能；而在「沒有對手」的自由民主體制當中，更是自始不承認對抗的本體地位，其對理性共識的執著同時也否定了政治動態中基進換位的可能。雙生的間隙既確保了民主政治中霸權性換位動態的可能，也確保了絕對純粹的對抗關係無以具體化的可能。民粹論述所模糊表述的「人民」，是此一雙生間隙的產物：

民粹……即是空意符的霸權運作與個殊性要求之等同，兩者之間的一個原初無以決斷的地帶。兩者之間存在著張力，而這個張力正是構建一個「人民」的空間。(Laclau, 2005a: 163)⁵

對於拉克勞以空意符所表述的雙生間隙，Rodolphe Gasché 曾經質疑，如果普遍性的內容無法預先決定，而是通過既有社會動態中對於民主—霸權計畫競逐而確定其內容，那麼，這樣的民主論述，是否無法預先排除「非民主」的內容？Gasché 並且質疑，如果無法確保非民主的元素佔位普遍性，在他看來，拉克勞固然反覆強調空意符本身的空無意涵，可以藉由其在本體論上無法切近，來避免非民主的要素最終成為實質界定對抗關係的可能，但這樣的立論，恐怕因為過於「形式主義」而無法作為確保民主政治正常運作的理論依據 (Gasché, 2004: 29-30)。事實上，Gasché 所忽略的是，在拉克勞的論

5 再次指出，在這段話中，拉克勞顯然也將雙生間隙的理論環節簡化。

述中，空意符同時是不同意義上的「間隙」。也就是說，空意符並不是「既」作為對抗關係的具體指涉，「又」作為霸權性形構的現實空位；在本體論層次上，空意符是對某種無法在表意體系中表述（因而是其整體性之條件），純粹對抗關係的模糊命名；而在實體政治動態層次上，它是作為霸權性形構爭奪地帶之「空」，但這個「修辭上的空」所表述的並不是現實上的空，而是指此一實體層次上的動態，這是為什麼拉克勞會強調，霸權所形構的普遍性並不是抽象的（abstract）：

普遍性的唯一可能是通過一個等同鏈（equivalential chain）而打造，這鏈結越是延伸，其一般化的等同就越無法附著於任何的個殊意義。然而，這個普遍性既非形式、也非抽象的，因為其傾向於空的一般化等價條件，是等同鏈不斷的延伸。作為結果的空，預設了具體……嚴格來說，沒有真正空無的意符，只有傾向（tendentially）為空的意符。（Laclau, 2000c: 304）

也就是說，在實體的政治動態層次上，空意符所表述的其實是一個既「傾向為空」又實為個殊性的普遍，兩者之間存在無法縫合的間隙；再更明確地說，空意符所表述的，既是對抗關係在純粹與具體之間間隙，也是特定元素實質上作為個殊與傾向為空之間間隙。固然在霸權對社會的形構中，無法排除任何特定的個殊元素（即使是「非民主」的元素），成為佔位普遍性的可能，在拉克勞的論述中，這樣的個殊元素是諸如自由、民主或人權的規範性訴求，還是類似經濟發展的反政治訴求，甚至是某些恐怕「政治不正確」的訴求，並沒有差別。對拉克勞來說，民主的動力，並不會因為特定個殊元素對普遍性的佔位，而受到阻撓，因為民主的動力是基於體系中因霸權的介入，元素關係網絡之間全然或者局部性換位的潛在可能。民主—霸權式的動態性形構固然無法（也不可能）確保非民主性元素的排除，但是，拉克勞所強調的是此一實體政治動態的變動。或者可以說，正是因為霸權動態性形構的存在，任何以非民主個殊要素建構霸權的企圖，才會遭遇根本的限制，對此，Simon Critchley 對於霸權論述的「規範性」之可能的闡述，可以

說相當精準：

許許多的政治決斷，在國家行政層次上的決斷，或者想要接管國家的決斷，都企圖否認其政治性格。也就是說，試圖藉由將政治決斷自然化或本質化，來抹去其權力、力量、意志與偶然性蹤跡，像是「科索沃，自古即是塞爾維亞的一部分」……政治振振有詞的主要策略是讓自己消失，以宣稱自己的自然地位或先在的自明性，這樣政治就能宣稱鞏固了社會的整全……而霸權顯露出社會的政治邏輯，揭露了這樣一種操作的不可能，終極縫合的時刻永遠不會到來，整個社會場域不容分說（irreducibly）是開放且多元的。社會是不可能的。（Critchley, 2004: 114）

在對施密特「游擊隊」理論這篇論文的「創造性詮釋」中，拉克勞指出，儘管游擊隊的存在反映了戰爭不會再被特定的戰場所侷限，但他呼籲，值得注意的是其背後的意象，也就是「區隔敵友的對抗性界線的延伸與深化」（Laclau, 2005c: 3）。施密特在這篇論文中批評將敵人絕對化所導致的毀滅性後果，他強調，「政治性的核心不是敵對（enmity）本身，而是友與敵的區分，以及友與敵的預設」，也就是說，對於敵對關係的不同想像，會衍生出不同的衝突想像。對施密特而言，歐洲的文明成就在於「拋棄了將對手入罪，是敵對的相對化，也是消解絕對的敵對」，這避免了在有限場域中敵對的「實際敵人」（real enemy），成為「絕對敵人」（absolute enemy），因而必須完全毀滅的可能。施密特批評列寧的共產主義政治戰略反其道而行，將實際的敵人變成絕對的敵人，並且警告，將敵人絕對化會導致將對手非人化與入罪化的後果，「拒斥實際的敵對，就會通往絕對敵對的全盤毀滅之路」（Schmitt, 2007: 90, 91, 95）。拉克勞認為，施密特對不同敵對關係樣態的討論，說明了劃定敵與友對抗性界線的紛雜與變動的可能，實際的敵人是伴隨著對抗性界線的「無處不可能」而潛在地無所不在，轉換成拉克勞慣用的詞彙，也就是說，在實體論層次上任何既定個殊元素都有佔位普遍性的可能，意味著通過任何對抗性界線來界定「對手」，都不會是僵固不動的，不同的對抗性界線

會劃出不同的對手，界定不同的實際敵人，然而，**敵人潛在地無所不在，也同時意味著朋友無所不在**，⁶於是，在劃界的交錯縱橫之間，產生了一個弔詭的效應，也就是絕對的敵人將不復存在。實際敵人的雜多化，卻指向了絕對敵人的不可能，正如拉克勞所說：

戰爭的普遍化，也就是建立政治的優位性，就有了一個相應的弔詭效應：不會有任何既定的絕對敵人，而是會出現一種狀況，實際敵人與絕對敵人兩極之間，形成了反覆擺盪的光譜……這個根本的擺盪意味著區隔兩個陣營的界線基本上將會是不穩定的。這並不是對於被認定是對抗狀態的政治的限制，相反地，是政治不會再有任何公認邊界這個事實的結果。然而，這也就意味著敵人的雜多化……**形成一個兩個陣營之間更全面的社會分歧，只會是把局部性衝突霸權化的脆弱效應**。若是狀況如此，唯一可能的結論就是：一個絕對敵人的概念，會有被拆解、被實際敵人的多元化所取代的必然傾向，其向絕對敵人的過渡基本上是不會完全的。(Laclau, 2005c: 9-10)

拉克勞對於實際敵人與絕對敵人的討論，其理論意涵是，在本體與實體的雙生間隙之間，存在一個立即的相互指涉，也就是說，**實體層次上多元的民主－霸權競逐，見證了本體層次上純粹對抗關係現實出現的不可能**。至此，不妨回應 Gasché「形式主義」的質疑，也就是說，只有在對抗關係可以被具體化的狀況下，民主才會失控成為某種右翼民粹主義的樣態，然而，**本體對抗關係具體化（「絕對敵人」）的不可能，則是透過實體層次上，霸權形**

6 在施密特對「與游擊隊有利害關係之有力第三方」的討論中，他指出，雖然第三方「依然是從一己之利思考與行動」，但因其涉入到此一敵友關係，因此「實際上，這是政治性的友誼，也是某種型態對政治的承認」(Schmitt, 2007: 91)。對拉克勞來說，「第三方」可以指涉那些並不具界定民粹性一致，然而卻會影響其霸權性內在建構的社會部門，例如，在支持與反對同婚各自的民粹性一致中，對於同婚議題並沒有強烈主張的宗教團體，即是這樣一個潛在為友與為敵的第三方。

構中個殊與普遍之間間隙（「真正敵人的多元化」）所確保，正是從實體間隙到本體間隙，兩者的相互指涉，才讓對抗關係的現實化成為不可能，讓對手過渡成為敵人不可能。

陸、結論：右翼民粹的誘惑？

拉克勞所闡述的「空意符」具有本體與實體兩種不同意涵，這點其實在其著作中並不難發現。就如 Oliver Marchart 所說，對拉克勞而言，政治既是「社會性換位（dislocation）的擾動性要素」，而作為「奠基性要素」，它同時也是「相對於社會的建制（the social's institution）的一個根本之外（radical outside）」（Marchart, 2007: 48）。然而，就如上節對於 Rodolphe Gasché「形式主義」指控的回應，僅僅只是表述拉克勞式政治在本體與實體不同層面上的形式意涵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純粹的對抗關係以及隨之而來對其的模糊指認，與本質上為個殊，而透過霸權形構承擔普遍地位從而「傾向」為空的佔位，政治的本體預設與實體動態之間同樣存在著「間隙」。而在左翼民粹主義這個主題上，雙生間隙之間立即性的相互指涉是關鍵的理論環節，拉克勞自己有時候並不加以區隔雙生間隙，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他將兩個間隙之間的立即性相互指涉視為預設，即便如此，本體與實體之間仍須做出區隔，且其立即性的相互指涉，也是確保左翼民粹戰略不致於變形為右翼民粹的必要理論配置，換言之，從實體間隙到本體間隙立即的相互指涉，讓基進民主的民粹論述，完全有別於「右翼民粹主義」。右翼民粹主義的理路是完全倒過來，藉由縫合實體的間隙，來表述本體間隙的縫合。雙生間隙之間的相互指涉，在理論層次上確保了左翼民粹主義的政治戰略，不會退化成右翼的民粹主義。

事實上，此一關鍵的理論環節也經常為研究者忽略。Oliver Marchart 固然區隔了實體上作為「擾動性要素」，本體上作為「奠基性要素」的政治，但如果不推敲出實體與本體間隙的相互指涉，則兩者就彷彿兩個孤立的理論環節。基進民主戰略的同情者如 Alexandros Kioukiolis 與 Stefan Rummens 的詮釋則是另一種典型，他們都認為本體的對抗關係與實體的霸權形構存在著

某種程度無法化解的張力，並都主張基進的民主構思應該著重後者而非前者。Kioupkiolis 認為應該避免以對抗關係將霸權的形構「超越化」，並提醒「執著於對抗可能會帶來肯定與複製反對方一致性的負面效應」（Kioupkiolis, 2010: 142）；Rummens 則別具新意地區別對民主體制基本價值的衝突，以及體制中開放的競爭（Rummens, 2009: 378），嘗試化解基進民主對於對抗關係的著重。這些詮釋反映基進民主的同情者自己也擔憂「民粹」的基進民主戰略，會因為對本體對抗關係的強調，而封閉了霸權形構過程中的動態競爭過程。但這樣的詮釋也忽略了拉克勞對於理論論述上「留心間隙」（minding the gap）的反覆強調（Laclau and Zac, 1994），需要留心的是本體的、實體的，以及本體與實體之間間隙。而如果引入本文對於雙生間隙之間立即相互指涉此一理論環節的詮釋，就毋須在對抗關係與霸權形構之間做出某種取捨。

不過，關於雙生間隙立即的相互指涉，或許還有一個「失落」的環節。先看 Anders Behring Breivik 的故事。2011 年，這位三十歲出頭的挪威青年發動了殘忍的炸彈攻擊與無差別槍擊，行兇之前他在網路發佈了長達 1,500 頁的《2083——歐洲的獨立宣言》。Breivik 是所謂「歐拉伯」（Eurabia）陰謀論的信奉者，認為歐盟的存在是一個要在文化上徹底同化歐洲的驚天陰謀，主導者是一些隱身幕後的穆斯林，他們操縱著歐盟的菁英，企圖把整個歐洲都變成穆斯林社會及同性戀社會；而他是聖戰騎士，有責任力挽狂瀾。在這起恐攻事件中，驚人的並不是對敵人的界定，而是 Breivik 在選擇以恐攻形式表達右翼訴求時，巨大的敵意情感（hostile affection），這樣的敵意情感也出現在 Eribon 的家族故事中。若說當前的右翼民粹主義有什麼特別可觀之處，恐怕就是這類敵意情感的驚人力量，儘管這很大程度上是拜媒體傳播環境與科技所賜。對一個幽靈般的敵人投射憎惡，在這個過程中也接合了其他的政治訴求（對歐盟的立場與看待同性婚姻的態度等等）。可以說，敵意情感是右翼民粹主義取消雙重間隙的主要媒介。而在拉克勞的論述中，情感力量的位置頗為曖昧。在回應規範性問題時，他將這類情感稱為「投注」（investment）。儘管拉克勞承認「任何的多重決定需要的不僅僅只是隱喻性的濃縮」，⁷ 同時也

7 「隱喻性的濃縮」所指的即是個殊元素對普遍的佔位，拉克勞後期越來越傾向以修辭學術語

需要有在情感面向上「玩真的投注」(cathectic investment)，而這樣的投注在社會的論述性建構中，也具有首要的地位 (Laclau, 2004: 326)。不過，嚴格來說，這類的投注在本質上並沒有特別之處，民主自由的價值與家庭和諧的價值，就其作為民主性需求而言，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而其各自所能得到的情感投注程度，以及所能接合其他要素的能力，事實上端賴特定時空背景下各種環境的作用。

對左翼民粹主義的「誘惑」在於這類敵意情感所具有的強大凝聚力，此堪為霸權形構的便宜手段。當慕芙也認為右翼民粹政黨是在沒有對手的自由民主體制中，唯一正視政治情感，提供出路的政黨時 (Mouffe, 2005: 56)，某種程度上，也是承認這樣的誘惑確實存在。對於「左翼民粹主義」頗有疑慮的 Didier Fassin 也質疑，左翼民粹「用想像的共同體代換實際的人民，用民族主義的呼籲來創造情感上的一致」，「都會造成某種左翼失去了靈魂，而且無法自圓其說的民粹主義形式」(Fassin, 2019: 90)。⁸ Fassin 對左翼民粹主

來重新闡述其政理論，從其生前最後的著作《社會的修辭性根基》(*The Rhetorical Foundations of Society*) 的書名可見一斑。

8 一位審查人提及左翼民粹戰略與馬克思思想之間在理論上的內在關連問題。其實，拉克勞是否是一個「本格」(authentic) 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個問題相當耐人尋味，我們在他的著作中看不到任何關於政治經濟的分析，Pedro M. Rey-Araújo 認為拉克勞缺乏政治經濟分析，因此其對於社會需求的概念、階級作為政治一致性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動態的分析，都有重新商榷的空間 (Rey-Araújo, 2020)；拉克勞與慕芙對「階級」概念的重新改造，也讓人懷疑他是否還堅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核心，Ellen Meiksins Wood 就嚴詞批評他們無視馬克思對階級的細緻分析，拿著「勞動階級會在技術條件的催逼下，機械性地以一致化的政治力量自動現身」的貧乏命題發展論述，最後再把馬克思主義的成與敗歸於能否放棄這個「簡單的決定論」(Wood, 1986: 56)；Norman Geras 則認為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系譜的梳理，過於單向與貧乏 (Geras, 1987: 48-50, 56-58)。拉克勞所接手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歐洲左翼運動實踐的反省：為何階級鬥爭沒有發生？他對於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政治主體、歷史法則與階級想像等等的討論是否成理，或有待商榷，但對他而言，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自我認同，所保留的是馬克思思想的一個核心要素：對於「階級鬥爭」的堅持，而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中孕育了一個新社會的可能，即便它不能以歷史法則之必然的方式呈現，如他所說：「我們的分析還是維持在馬克思主義的場域，而且嘗試強化其一直以來的優點：完全接受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轉型，以及在這些轉型，而非對立，所創造的根基之上，建立另一種方案。」(Laclau, 1990: 55-56) 本文強調「無法消解的對抗」是左翼民粹論述在面對自由民主體制空洞化時「不得不」的核心本體預設，而其實，堅持「階級鬥爭」之必要，也是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必要的自我認同，在此自我認同的觀照下，不妨

義的誤解是認為它打算援用右翼民粹主義的敵我想像，來挽救左翼政治。其實，無論是 Richard Wolin、Didier Fassin 乃至於 Rodolphe Gasché，都在質疑對抗關係的預設，以及通過接合異質性社會要求而動搖既有霸權形構的民粹論述，兩者之間是無法相容的，這是因為他們都在某種意義上認定，對抗關係必然以某種高度情感投注的方式而實體化，拉克勞與慕芙自然不會否認民粹的形成有其情感投注上的比重（人民的不滿），關鍵是在理論層次上，如何讓某個具有高度情感投注可能，或者是「反民主」的元素，在重新形構霸權的過程中，不至於因為壟斷並主導了對社會矛盾的詮釋，而破壞民粹性要求不同接合的動能性？本文認為，拉克勞對於這個攸關左翼民粹戰略之何以有別於右翼民粹的理論問題，可以說採取了一個迂迴的辯護。正如本文所闡述，他首先透過本體論上無以名狀、作為對抗關係的「政治性」，來指出內在體系中意義變動的機緣，而在這個實體政治動態的霸權佔位過程中，藉由個殊元素承擔建構霸權普遍性而「傾向為空」的空意符，所表述的是個殊與普遍之間不可能縫合的間隙，透過這個實體政治動態上的間隙，確保了本體層次上的對抗關係，不會以「絕對敵人」的敵我對抗形式出現，這是一個從本體到實體，中介本體與實體雙生間隙的立即指涉，再從實體回到本體的理論迴路。就其現實政治的戰略意涵來說，某些具體的訴求（諸如民族主義、環境生態甚至家庭和諧等等），或許可以在某個時間點或者脈絡下，成為承擔普遍性之霸權建構的個殊元素，但這並不會封閉重新接合不同元素，以此重新形構霸權的可能，也是在這個實體政治動態的間隙對於本體政治間隙的立即指涉，確保了既有民粹「等同鏈」所指涉的「對手」，無法以實體的形

說，左翼民粹戰略對於本體對抗關係的堅持，並不是出於任何對「敵人」的投射，而是堅持認定，資本主義生產所造就的社會關係，始終存在基進全盤變革的可能。面對紀傑克批評他對資本主義生產的關注不足時，拉克勞的回應是「馬克思主義者很早就知道資本主義這個世界體系是以帝國主義式的鎖鏈所構成」，但也是在這樣的體系中，「讓許許多多的社會部門深受資本主義式的邏輯所脅，而由之而生的對抗並不必然與生產關係中的特定位置有關」。放棄對階級概念的同質化表述，不等於放棄「階級鬥爭」，相反，這是正視「危機會在許許多多的其他點上創造換位」的資本主義現狀（Laclau, 2000b: 203）。堅持階級鬥爭不是為了嚴守理論教條，或者左翼運動者本人的好鬥，而是身為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一個社會終究能在「階級衝突」的對抗關係想像中看到權力關係的重構，與一個新社會的潛在可能。

象出現。

由基進民主理念所支撐的左翼民粹戰略，始終關注的是政治對社會的民主—霸權性形構，必須保持其內在元素之間換位，從而開放的可能；同時，就如拉克勞反覆強調，意義體系中特定元素的意義，是由整個體系中的關係網絡所界定，個別元素是否是「右翼主張」甚至是「反民主」，並不影響民主—霸權形構動態中，通過接合異質性要求而形成不同樣態民粹性等同鏈的機緣。當前的右翼民粹主義，確實存在其特有的強烈情感投注，但是，意圖將右翼民粹「拿來用」，或者認為找出一個足以鼓舞出同樣強烈情感投注的「左翼」主張，從來都不是「左翼民粹」戰略的選項。通過實體政治動態的間隙對於本體政治間隙的立即指涉，「民粹」所表述的既是無法實體化的對抗關係，也是將既有的霸權形構通盤換位的機緣所在，民粹既不是反常的政治現象，也不是錯亂的政治表述，它是「政治」的根本邏輯（Marchart, 2018: 110）。左翼民粹戰略的「現實性」在於它認識到進步的政治議程不能單單透過作為孤立的社會需求來倡議，戰略上必須思考其接合其他社會需求而進行霸權性佔位的可能；而其「理想性」在於，既然右翼的民粹論述已經展現了其有效接合本為左翼的社會需求，那麼，始終存在另一種霸權形構的可能。

無論從基進民主論述的理論建構，或者政治現實上的情感投注來說，對於左翼民粹主義而言，「右翼民粹主義」的誘惑從來都不是其作為左翼民粹戰略的選項，「右翼民粹」的崛起並不是左翼政治的救贖，相反，正如慕芙所說，必須把這個現象視為「整個 80 年代在西歐所實施的，新自由主義霸權形構的危機」（Mouffe, 2018: 11）。右翼民粹的現象，反映了體系中孤立的民主要求因為無法被體制吸納，因而接合成為某種民粹性要求，而這是左翼政治的契機。拉克勞與慕芙從來都不是 Richard Wolin 所批評的「裝睡的左派」，基進民主乃至於左翼民粹戰略的提出，同時也是對於近年來以「佔領」形式湧現社會運動的深刻反省。對他們兩人來說，這些以水平（horizontal）面向遍地開花的「廣場運動」（movements of the squares）的抗爭形式，所忽略的是在霸權形構的實體政治動態中，始終應該要有一個建構政治一致性的垂直（vertical）面向。早在佔領運動風起雲湧之前，拉克勞就指出：

社會要求的碎裂化不是讓國家機器更運用行政手段，形成各式侍從網絡，抵銷了一切民主的開端嗎？而這些社會需求自身的水平式擴張，會讓政治體系相當敏感以致得要暗幹拐子（conspire against）的是，他們在一個民粹意志下，足以挑戰現狀的垂直集聚。（Laclau, 2001: 3）

民主不能只是散落在各處、個別局部的抵抗，這是拉克勞在過世前一年對於風起雲湧的佔領運動的警語，他說，「假如無法搭配垂直面向的霸權，自主的水平性面向僅就其自身，將無法帶來長程的歷史變革，亦即，國家的基進轉型」（Laclau, 2014: 9）。「拒絕與政治體制打交道」的佔領和廣場運動，所忽略的正是「與體制政治接合的形式」（Mouffe, 2018: 19-20）。⁹ 右翼民粹崛起的現象，所反映的既是新自由主義霸權的危機，也是基進民主重新奪回至少從 90 年代就被「中間路線」壟斷的左翼政治戰略的契機，當前的政治情勢對於有能力與體制「打交道」的左翼進步政黨來說大有可為。對慕芙來說，希臘的基進左翼聯盟（Syriza）、西班牙的「我們能」（*Podemos*）、德國的左翼黨（*Die Linke*）、葡萄牙的左翼集團（*Bloco de Esquerda*），乃至於法國的不屈法國（*La France Insoumise*）等等進步左翼政黨的崛起，在在顯示了拒絕右翼民粹誘惑，挑戰新自由主義霸權的「左翼民粹主義」戰略，是切實可行的政治選項（*ibid.*: 20-21）。

天下大亂，情勢大好！

9 某種意義上，這是拉克勞與慕芙在理論書寫上所刻意迴避的「政治主體」問題，儘管在實踐上，它不難推導出來：正如前述，在左翼民粹戰略的構思中，主角是建制的左翼政黨。只有建制的左翼政黨，才有通過霸權形構，將不同社會要求集結的政治能力；只有建制的左翼政黨，才有既堅持爭勝的對抗關係，又能不「反體制」的政治能力。更直接地說，只有建制左翼政黨才有執行基進民主左翼民粹戰略的能力。筆者認為，基進民主的左翼民粹戰略，根本意在挽救自由民主體制，也只能依附於自由民主的代議體制，而拉克勞在這裡意在言外所要表述的恐怕是：如果不以有機會執政，並掌握國家機器的建制左翼政黨為戰略主體，所有的政治抗爭最終難免一場空。筆者感謝審查人意見的啟發。

參考資料

- Anderson, Perry
1976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LB.
- Critchley, Simon
2004 “Is There a Normative Deficit in the Theory of Hegemony?” pp. 113–122 in Simon Critchley and Oliver Marchart (eds.), *Laclau: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Verso.
- Eribon, Didier
2013 *Returning to Reims*. South Pasadena, CA: Semiotext(e).
- Fassin, Didier
2019 “The Blind Spots of Left Populism,” *Krisis: Journal for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1: 87–90.
- Gasché, Rodolphe
2004 “How Empty Can Empty Be? On the Place of the Universal,” pp. 17–34 in Simon Critchley and Oliver Marchart (eds.), *Laclau: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Verso.
- Geras, Norman
1987 “Post-Marxism?” *New Left Review* I/163: 40–82.
- Kioupkiolis, Alexandros
2010 “Radicalizing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 17(1): 137–154.
- Laclau, Ernesto
1987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Verso.
1990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New York: Verso.
1996 *Emancipation(s)*. New York: Verso.
2000a “Identity and Hegemony: The Role of University in the Constitution of Political Logics,” pp. 44–89 in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Žižek (eds.),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Contemporary Dialogues on the Left*. New York: Verso.
2000b “Structure, History and the Political,” pp. 182–212 in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Žižek (eds.),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Contemporary Dialogues on the Left*. New York: Verso.
2000c “Constructing Universality,” pp. 281–307 in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Žižek (eds.),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Contemporary Dialogues on the Left*. New York: Verso.
2001 “Democracy and the Question of Power,” *Constellations* 8(1): 3–14.
2004 “Glimpsing the Future,” pp. 279–328 in Simon Critchley and Oliver Marchart (eds.), *Laclau: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Verso.
2005a *On Populist Reason*. New York: Verso.
2005b “Populism: What’s in a Name,” pp. 32–49 in Francisco Panizza (ed.),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New York: Verso.
2005c “On ‘Real’ and ‘Absolute’ Enemies,” *CR: The New Centennial Review* 5(1): 1–12.

- 2014 *The Rhetorical Foundations of Society*. New York: Verso.
-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al Mouffe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rk: Verso.
- Laclau, Ernesto and Lilian Zac
1994 "Minding the Gap: The Subject of Politics," pp. 11-39 in Ernesto Laclau (e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Identities*. New York: Verso.
- Marchart, Oliver
2007 *Post-Found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 Political Difference in Nancy, Lefort, Badiou and Laclau*.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6 "Laclau's Political Ontology,"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15: 318-324.
2018 *Thinking Antagonism: Political Ontology after Laclau*.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Mouffe, Chantal
1993 *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New York: Verso.
2000 *The Democratic Paradox*. New York: Verso.
2005 *On the Political*.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Agonistics: Thinking the World Politically*. New York: Verso.
2018 *For a Left Populism*. New York: Verso.
- Mudde, Cas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2017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ey-Araújo, Pedro M.
2020 "Ernesto Laclau's Obliv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Capitalism and Institutions in Post-Marxist Discourse Theory," *Rethinking Marxism* 32(2): 187-206.
- Rummens, Stefan
2009 "Democracy as a Non-Hegemonic Struggle? Disambiguating Chantal Mouffe's Agonistic Model of Politics," *Constellations* 16(3): 377-391.
- Schmitt, Carl
1985 *The Crisi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Ethic of State and Pluralistic State," pp. 195-208 in Chantal Mouffe (ed.), *The Challenge of Carl Schmitt*. New York: Verso.
2007 *Theory of the Partisan: Intermediate Commentary on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New York: Telos Press Publishing.
- Smith, Anna Marie
1998 *Laclau and Mouffe: The Radical Democratic Imaginary*. New York: Routledge.
- Wolin, Richard
2006 *The Frankfurt School Revisited: And Other Essay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 Wood, Ellen Meiksins
1986 *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 London: Verso.
- Worsham, Lynn and Gary A. Olson
1999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Ernesto Laclau's Political Philosophy,"

pp. 129-164 in Gary A. Olson and Lynn Worsham (eds.), *Race, Rhetoric, and the Postcolonial*.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For a Left Populism: Reflections on Theory and Strategy

Yu-he Hsiao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theory of radical democracy developed by Ernest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in hopes of elucidating two theoretical moments in left populism: antagonism and hegemonic formation. On one hand, as a political ontological assumption, antagonism as “the political” cannot be embodied by any concrete enemy. On the other hand, the effect of hegemonic formation in ontic political dynamics is represented by the taking up of universality by particular elements, in which 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compete in their efforts to present their particular objectives as those which carry out this filling function. In the theoretical concept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 the double gaps emerging in ontological and ontic aspects and their immediate mutual reference make left populism totally different from right-wing populism.

Key Words: left populism, radical democracy, antagonism, hegemony, the immediate mutual reference of gaps